

# 快递业首部行政法规 5月起施行

## 苦难与辉煌

（上接1版）主任尼玛次仁说：“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了！希望大家团结得像一家人，我们才能生活！”

同年12月，西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克松成立，索朗顿珠的父亲阿旺成为首批5名党员之一。没上过一天学的基嘉，入党申请书是请人代写的，她按了手印。

1960年，克松建乡。两年后，基嘉的女儿洛桑曲宗出生了，不久，她就在克松乡小学拿起了课本。

自治区成立后，克松建立了人民公社。1968年，克松人将过去的悲惨生活编成舞台剧《旧社会的苦》。每次演出，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回声】《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说：“这不仅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篇章，而且在国际禁奴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疑是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历程中彪炳千秋的一个伟大壮举。”

### 奋斗

【历史】1984年，克松乡恢复，同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大潮在这片土地上风起云涌，昔日农奴的后代们，为过上好日子，甩开臂膀干。

【岁月】拥有1400多亩肥沃土地的克松村，实行承包后，农业产量不断提高。22岁的村民达瓦脑筋转得快，农闲时带着剩余的粮食，再买一些小汽灯等日用品，到附近的牧区交换肉、蛋、奶等畜产品，改善家里的生活。

15岁的米玛次仁加入了一个电力工程队，参与电站施工，从南部河谷到藏北草原，为各地群众带来光明。

1985年，村民土多买了村里的第一台东风卡车，并发展成为村里第一个万元户。此后，交通运输业一直是克松人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

20岁的边巴次仁初中没毕业就回村当了木匠，跟着师傅到处盖房子、做家具。1987年，老支书洛桑告诉他：“党员就是帮助别人做好事的，做一名党员很光荣！”他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村里的会计，一干就是20年。

1998年，先后在砖厂、学校工作的达瓦回到村里，贷款3000元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之后，他的车不断翻新：东风卡车、收割机、中巴车、翻斗车、重型卡车、出租车，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2003年，他还和朋友合伙在泽当镇开了餐馆，多种经营的路越走越宽。

村集体经济也在不断壮大。2009年，在上级和援藏队的支持下，建起89座温室大棚，“80后”的白玛央宗与丈夫承包了10个大棚，每年收入达10万元。

边巴次仁说，上世纪90年代初、2006年前后，村里共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房屋整修，家家户户住房焕然一新，有的房屋先后翻修了四五次。

【回声】2009年3月26日，克松居委会全体居民在致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公开信中说：“50年来的新西藏，‘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我们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家家户户住楼房、穿新衣、吃美食、有存款。我们的日子比蜜还甜！”

### 幸福

【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克松村迎来巨变：国家投资3000多万元，启动“生态文明小康示范点”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农业机械化作达90%以上。2017年，社区872人中，300多人常年外出务工，人均收入超过17000元；242户居民中有115户拥有各类车辆；17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岁月】走进克松居委会，进村大道宽阔平整，两边是数十间商铺、茶馆；入户水泥路干净整洁，藏式楼房顶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街巷里，人们围桌而坐，相谈甚欢。

2014年，达瓦花30多万元建起了家中的二层小楼。近两年，他和二儿子先后买了私家车，还帮在拉萨工作的女儿购房付了首付。

依靠自学自主选择人生道路，已成为克松年轻人的“标配”。居委会党委书记边巴次仁说，居委会现有50多名在校大学生，“历届毕业的大学生有130多人”。

他儿子白玛桑珠大学毕业，在昌都市丁青县沙贡乡沙贡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他在电话中经常教儿子如何干工作：“村里贫困户多，必须发展产业。办事要公平公正，做一个廉洁的人。”

设在克松居委会的昌珠镇完小和幼儿园，书声琅琅。55个克松孩子，分布在各个班级里。13岁的边巴桑珠说，他喜欢唱歌，最喜欢的是《红旗飘飘》，“长大后想到北京上大学”。

春天的雅砻河谷，冬小麦已经返青。农田的西边，是200亩郁郁葱葱的沙棘林，一条绕村环形公路已经成型。边巴次仁和党委第一书记卓玛筹划着，新时期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村两委要借助乃东区作为西藏农村改革试验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县的发展机遇，让克松人尽快奔向小康。

“纵观克松村‘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历史，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研究员伍达说。

【回声】山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乃东区委书记尼玛次仁说：“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克松村，迎来发展城郊经济、注重旅游文化融合、红色基因传承的好机遇，必将成为全面小康的先行村、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成为党中央治边稳藏战略在西藏成功实践的一个缩影。”

新华社拉萨3月27日电

准，充分考虑企业感受向消费者传导的过程，在制度设计上坚持有效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服务民生方面，着力完善快递服务规则，规范快递秩序，理顺法律关系，使企业和用户形成明确的法律预期，引导企业不断提升服务水平。通过具体的规范明确行为预期，特别是针对业内普遍采用的加盟经营模式，明确了制度规范，对快递服务中容易产生纠纷的问题作出相应规定。

在保障安全方面，从制度上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着力保障公共安全和用户信息安全。条例立足实际情况，聚焦快递业安全发展的老问题和新挑战，对用户的电子数据信息安全进行了专门规定，立法过程中充分研究了企业使用电子运单等形式保障信息安全的做法，对企业违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据国家邮政局统计，我国快递业务量规模已经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每年新增就业20万人，对全球包裹快递量的增长贡献率超过了50%。我国已经有7家快递企业陆续上市，形成了7家年收入超过300亿元的企业集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魏际刚说，条例明确了快递领域政府与企业的责任，清晰地划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完善了快递市场和快递管理的体制机制，提出了促进快递发展的各类重大举措。条例明确提出，鼓励企业开展进出境快递业务，支持在重点口岸建设进出境快件处理中心，支持在境外开办快递服务机构，设置快件处理场所。这将为我国构建连接全球的快递网络、构建全球物流运营和供应链服务体系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撑。

新华社记者陈芳、吴振东、陈聪

作为“世界屋脊”，西藏的山离天空最近。植物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钟扬的心离西藏最近。

破旧的双肩包、褪色的卷檐帽，胖胖的脸上总挂着阳光般的笑，这是钟扬在雪域高原留下的永恒身影……

2001年，钟扬第一次进藏，只因青藏高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向往的地方”。

当时的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还是“三个没有”的状态：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

“这片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的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钟扬说。

钟扬立誓：植物学博士点不批下来，自己就不离开西藏！

西藏大学的老师们一开始也不看好钟扬：他一个从上海来的年纪轻轻的教授，就能让西藏大学的科研大换面？

但是，钟扬硬是留下来了，连续成为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扎根高原整整16年，在西藏行走超过50万公里，直至生命结束。

这就是钟扬的西藏情！

2002年，钟扬和西藏大学同事琼次仁一起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结果失败了。他安慰琼次仁：“万事开头难，明年再来！”两人继续进行高密度的野外考察，高原反应严重时，钟扬常常是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研究报告。

2003年，申报终于成功，这是该校获得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整个西藏大学沸腾了。

“他不是来办几次讲座，做几个项目，而是真正把复旦大学最新最好的科研和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输送给我们。”西藏大学研究生处原处长欧珠罗布说。

在西藏，他不敢放过任何一颗可在当地生根发芽的“种子”。

藏族青年教师拉琼连着好几年被钟扬劝说报考复旦大学的博士，拉琼说：“他是为西藏培养自己的高原科学领军人才着急。”

十几年来，钟扬的学生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肃等多个西部省份。由他培养的藏族首位植物学博士扎西次仁已成为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博士生拉琼已成为西藏大学生命科学系第一位生态学博士生导师，哈萨克族首位植物学博士吾买尔夏提回到新疆农业大学任教，成为民族地区急需的科研教学骨干……

“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这是钟扬自己的“援藏模式”。

在他的指导下，西藏大学还陆续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拥有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2017年，西藏大学生态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名单……

“他是耕耘在科研、教育战线的孔繁森，为我们点亮了心灯。”欧珠罗布这样表达对钟扬的敬意和怀念。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 为祖国每个民族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援藏十六年，复旦大学教授钟扬的西藏情

## 巴山深处的留守夫妻教师



“叶老师，你可不能再走了，你走了，我们学校就没人了，我们的娃儿们就没人教了。”乡亲们恳求说。2016年夏天，51岁的乡村教师叶叶平在自己的同事陆续调离后，最终决定继续留在已任教11年的陕西平利县西河镇任家坝小学。他还申请将在镇上其他小学任教的妻子李照琼调至自己所在的学校，夫妻二人成为任家坝小学仅有的两名老师。

平利县西河镇任家坝小学位于秦巴山区深处，距离县城有约30公里山路。2010年撤乡并镇后，村民陆续迁出大山，村里人口越来越少，学校学生也越来越少。任家坝小学由一所完全小学变成了现在只剩学前班和一年级的教学点，学生也由三四百人减少到现在的十五人。叶叶平和李照琼全力照顾每个学生。他们手把手教孩子们写字、耐心讲解每一道题；冬天孩子们来上学前就生好火炉、烧好热水；家长不能送中午饭时就给孩子们做饭、安顿孩子午休。最让叶叶平和李照琼高兴的是，从自己学校转去其他完全小学上学的孩子学习成绩都非常好。

▲李照琼和叶叶平（右一）带着学生在校门口的油菜地了解油菜花的知识（3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叶叶平教学前班的学生写拼音（3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 我们再也等不起了，必须和时间赛跑

记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抢救者”和“守望者”胡彬彬及其学术研究团队

新华社长沙3月27日电（记者苏晓洲、谢樱）30多年来，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和他率领的研究团队专心做了一件事：系统考察和研究传统村落，探究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与价值。为此，胡彬彬走过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随着国家对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越来越重视，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研究，中华村落文化薪火相传有了新希望。

### “传统村落差不多每两天消失一个”

2018年初，记者走进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古朴灵秀的湘西古建筑群、坚实粗犷的藏族碉房、形状各异的福建土楼、精致典雅的徽派建筑……这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传统村落文明形态，是胡彬彬眼中珍贵的“文化活化石”。

“村落，是中华民族国家和社会最基本单元。”胡彬彬说，当下，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扑面而来，以农耕文明为背景产生的中国村落文化正面临严峻考验。

“农村传统意义的农民已越来越少，村子里大多数人进城务工，这种局面，导致农民群体对老宅、山林田塘的感情日益淡化。”研究中心成员刘灿灿教授说。

“传统村落差不多每两天消失一个，很多地方初还还原汁原味，古风令人惊艳。几年后再访，已面目全非或不复存在。”胡彬彬说。

### “拼命三郎”抢救行动“与时间赛跑”

“每个传统村落都是正在续写的文明史‘大书’。”胡彬彬说，他

和团队的研究从实物资料和亲临现场实地考察着手，成果完全靠双脚“走出来”。

30多年来，胡彬彬田野考察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30多年来，青灯伴影伏案劳作。胡彬彬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考察札记，拍下了近二十万张数码照片，手绘了近千张古村落建筑式样图，撰写研究专著十余部，在海内外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各类研究论文八十余万字。

“胡教授在家排行老三。我们就叫他‘拼命三郎’。他几乎全年无休，在农村一呆就是几个月。”刘灿灿说，胡彬彬进行田野考察时，不打学校和自己的名头，坚持在农民家里搭餐或野地里泡面充饥，寄宿无门时风餐露宿。

“胡教授田野考察归来，就是在办公室整理材料做研究。”研究中心博士吴灿灿告诉记者，因为常年坚持田野考察，胡彬彬的腿出现血管坏死症状。“一到下雨天腿就痛，可是没人劝得了，劝多了他还生气。”吴灿灿有些无奈。

“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和全面深入研究，是当前我国文化传承、文化繁荣和发展的迫切需求。”胡彬彬认为，他们这些“抢救者”和“守望者”必须和时间赛跑。

### “家国情怀”志在守护“文化安全”

记者从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了解到，中心学者们长期的研究，已经深入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基本内核“心性”与“治平”层面。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建筑营造与堪舆规划、生产生活与经济模式、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宗法礼制与村落治理、民族民俗

与宗教信仰、民间艺术与手工技能、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等。通过对村落活态文化研究，民生为本、家国一体、崇德尚礼、守望相助的中国村落文化精神，令每一个参与研究者都深受触动。

近些年，不断有西方学术机构找上门来要求合作，对此，胡彬彬等人一概拒绝。“这是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文物，我们必须要有保护自己的首次研究权、话语权。”

保护村落文化，也会遇到很多反对者，这令胡彬彬和他的团队感到最为无奈。“你们做这个干嘛？”“我拆房子和你有什么关系？”更令胡彬彬担忧的是，一些人把建设新农村与保护传统村落文化资源完全对立起来。“我赞成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和条件，但要把古村落文化转化成让村民共享的‘文化红利’和向往的‘美好生活’，促使他们自发地成为村落的守护者。”

让胡彬彬等人感到欣慰的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和国家对农村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谋划。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研究与振兴，又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期”。“我们的研究得到了国家和地方、中南大学的强力支持，申请加入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这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村落文化薪火相传的无穷力量。”

